

决策参考

Jue ce can kao

第六十三期（总第 313 期）

盐城市图书馆编

2009 年 3 月 30 日

主编 刘进 责编 周玉奇

zhouyuqi@gmail.com 13905103528

编者按：2008 年 9 月 15 日，美国雷曼兄弟被允许破产，世界从此不一样了。在随后的几周里，亨利

美国财长做出了错误判断，他褪去光环，从万众期待的拯救者沦为了“不知道先生”。

金融危机正在世界深度蔓延，并且正在涉及全球实体经济，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两会”如期于 3 月 3 日和 3 月 5 日在北京召开，这自然聚焦了世人的目光：中国政府将出台怎样的经济政策，中国将如何推动经济引擎高速运转去？中国将给世人怎样的信心与力量？

本刊在上期推出“金融危机与中央一号文件”之后，特此推出“金融危机与‘两会’”系列专题，同时新辟《高层一瞥》栏，敬请关注。

要目

●卷首语：让大学生村官走得远也留得住

●本期专题“大学生村官”

北京首批学生村官任期将满 2016 人面临重新抉择 上海大学生村官回校园招人

“大学生村官模式”从农村包围城市是否大材小用

政府应发放特殊补贴鼓励大学生农村就业

湖南安乡：用活大学生“村官”为新农村添活力

四川“大学生村官”：路怎么走

●延伸阅读

直面大学生创业“三重门”

国外如何鼓励大学生创业

●高层观察

薄熙来妙解“干”的六层含义

●卷首语：

让大学生村官走得出去也留得住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以来，当今中国有两种人最让全社会揪心，一是农民工，二是大学生。前者暂不表，先说说大学生。自2007年以来，江苏省委、省政府先后选派两批2600多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今年的3月17日至18日，省委书记梁保华在盐城市就做好当前工作进行考察、调研时，他还专门抽出时间看望大学生“村官”。

在阜宁县阜城镇城北村，他与在阜宁、滨海工作的十多位大学生“村官”亲切座谈。何娅娅、刘庆庆、袁媛等三位大学生“村官”汇报了各自的工作情况和到村任职的体会。兴办禽蛋专业合作社、帮助村民建蔬菜大棚、发展畜禽养殖……谈起到村任职以来所做的工作经历，大学生“村官”们共同的体会是，“在农村工作虽然苦一点、累一点，但更能锻炼人、考验人”；“只要为大家办一点事，农民群众就会信任你、支持你”。

17日傍晚，梁保华特地来到大学生“村官”杨晶晶任职的滨海县八巨镇巨峰村考察。自2007年到村任职以来，杨晶晶和村干部们一道，带领村民修建农村公路、发展果蔬设施栽培、兴办杭白菊合作社、建起万头养猪场，赢得了村民群众的信赖，去年3月光荣当选为村党总支书记。杨晶晶信心十足地表示，依靠这三大产业，今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望比上年提高1000多元，这已写进了她对全体村民的“双学目标承诺”中。梁保华书记对杨晶晶勇于自加压力，立志改变贫困村面貌的良好精神状态表示赞赏。

几天后，我们在盐城电视台“交流”栏目里又见到了快人快语的杨晶晶。她和另两位“村官”周大川和朱天文在一起接受主持人的访谈。当主持人在问到当“村官”以后的打算时，杨晶晶说，准备在农村大干十年，问周大川这位来扬州的小伙，他说，将来的事等到将来再说，问朱天文，他显然胸有成竹，准备过两年考公务员。

人生是丰富多彩的，他们三个人的回答也是各具特色。杨晶晶看来已小有成就，对新农村的未来充满期待，她信心满满，要在农村大干十年。周大川的回答委婉巧妙，充满辩证唯

物主义色彩，既然将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今后的路怎么走，就留待将来再考虑吧，现在是不能把话说死的。朱天文这个小伙子是相当地直爽，过两年考公务员。说到他是相当地不容易，去年报考“村官”前，他就已经在杭州一家电子公司找到了工作，但还是放弃在城里工作的机会，力排众议，毅然报考了村官。

关于“大学生村官”的出路，近期一些地方相继出台了报考公务员、优先推荐到企业任职等政策。其目的是告诉那些大学生们，你们今天的“上山下乡”同当年那些知青是不同的，你们不仅可以在新农村打出一片新天地，还会有宽敞的出路，来去都是自由的。农村是你们了解国情、熟悉社会的大课堂，是你们成长成才的沃土，是你们创造、创业、创新的广阔天地，是大有可为的。

但这都是为解决大学生“离开”而制定的政策，并没有为杨晶晶那些准备在农村大干上十年的大学生“村官”提供保障性政策。据北京市人大代表中惟一的“大学生村官”陈丽娟广泛地征求房山、平谷等地数百名“大学生村官”的意见，她惊喜地发现，“期望期满后继续留下来的人很多”。现在要留下来的人是很多，但如果优惠政策不配套或者跟不上，“煮熟了的鸭子”迟早也会飞走的。

新农村的“新”不仅在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二十字要求，如今还有一“新”，那就是大学生“村官”作为“80后”的新鲜血液，充实到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进行新陈代谢，让新农村真正地充满朝气与活力。大学生意气风发地走向新农村当村官，这不仅是政府释放就业压力的需要，不仅是大学生更新择业观的需要，也是新农村长治久安的需要。我们在鼓励大学生走向广阔天地时，应尽快完善大学生到村任职的政策，从合同期满并且愿意留在农村、服务基层的“大学生村官”中选拔政治素质好、工作业绩突出、发展潜力大的优秀者，及时纳入基层干部培养链条进行系统培养。只有使大学生村官管理机制系统化和科学化，充满生机与活力，他们工作上才有干头，事业上才有奔头，政治上才有盼头，“大学生村官”才能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大学生村官”这种崭新的选人用人机制也才会有生命力。

●本期专题 “大学生村官”

北京首批学生村官任期将满 2016 人面临重新抉择

2009年7月，北京市将有2016名大学生“村官”从1853个行政村结束三年任期。他们

是北京市第一批大学生“村官”，有人将他们比喻成新时代上山下乡的“知青”。再过三个月，是考上研究生或公务员、找工作，还是续签，他们将重新作出人生的一次重要抉择。

履职三年，“新知青”给农村带来了什么？农村又改变了他们什么？3月19日，本报记者特地探访了一名大学生“村官”，听这个地道的北京籍城里孩子，讲述在房山区做村官3年的酸甜苦辣以及对未来的忐忑不安。

从“去与不去”到“走与不走”

位于北京远郊的房山区东北部的青龙湖镇石梯村，因为京石高速路的贯通，与北京城区的车程一个半小时。毕业于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吴琼现在是石梯村的村支书助理。

上午9时，走进石梯村，记者打听吴琼的住处。“我知道，跟我走吧！”村口的大婶很热情地带路。刚到村委会办公楼门口，大婶喊了一嗓子：“大学生，有客人来了。”只见一个穿套头帽衫、黑色牛仔褲的“小平头”跑了出来。他向记者伸出双手，用力一握：“我就是吴琼”。

吴琼的宿舍紧邻村支书的办公室，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两张单人床上被褥叠成了不太标准的“豆腐块”，两张简易桌子上除了一台电脑外，还堆满了文件及肥皂等生活用品。他与另外一名村官、来自浙江宁波的卢胜辉合住在这里。

吴琼今年25岁，家住木樨园，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从小一直都生活在城市中，所学的专业也是和农业毫不沾边的青年教育。2005年12月，吴琼在学校的告示栏里看到招聘“村官”的消息。经过了笔试、面试后，吴琼成为北京首批大学生“村官”中的一员。“你是北京人，又不要解决户口，考‘村官’干吗？”吴琼没有理会同学的疑问，还是兴高采烈地把考上“村官”的消息告诉了父母。

本以为父母会高兴，没想到他们的脸色却沉了下来。“妈妈告诉我，农村工作不是三五年就能出成绩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三年任期结束后还将重新择业。”母亲的话让吴琼有些犹豫，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三天，去还是不去在他心中反反复复了许多次。“那时候，薪水是多少不知道，当支书助理和主任助理究竟要干啥也不清楚。”吴琼把选工作比成找女朋友，“可以不找，但是不能让自己赋歪。”三天后，他满脸笑容地“出关”了。“我打算试试。对我来说，这是个全新的挑战，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触基层工作，还可以开阔视野，积累经验，这样才能实现我自己做CEO的梦想。”

3年后，母亲的话得到了应验，当了三年“村官”的吴琼果然站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上。而自2008年下半年起，每次周末回家，母亲唠叨的话题不再是抓紧找女朋友，而是变成“想找工作还是留下？”吴琼的回答总是“让我再想想。”然后便低头不语，逃到自己的小屋，戴上耳机把音乐声调到最大。“每次回家都要问我是走还是留，我自己都还没想明白呢。”

当初不知农村现在害怕社会

将近 12 点，吴琼开始忙活午饭，一旁的卢胜辉还没等第二个菜上桌，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吃起来。三年前，吴琼连炒鸡蛋都不会，“现在做 10 个菜没问题，红烧肉最拿手了。”

招商引资、创建工厂、发展商业……几乎每个大学生“村官”都是带着“改变一方面貌”的宏伟理想上任的。“但实际工作开展以后，我们逐渐明白，农村工作实际上就是从身边的琐碎小事做起的。”吴琼刚到村里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插不上手，只能做些沏茶倒水、接待客人、打印文件之类的事情。“工作一段时间后，才开始变得更加理性和务实，静下心来学习和调研。”

吴琼坦言他不喜欢“村官”这个称呼，“我们不是官，至少我没有把自己看成官。我在这儿啥活儿都管，民调治保、招商、写工作报告，甚至连计生都要管。”吴琼还记得第一次敲开村民家门送计划生育宣传册时的尴尬，他低着头把宣传册塞给村民后，只是笑笑便匆忙离开。吴琼说，大到村子的建设、经济发展、文明建设，小到婆媳关系、邻里纠纷、民生民情都需要了解，“有的时候村民家的猪丢了，都会来找村干部。”

石梯村是一个只有 400 多人的小村子，却因盛产核桃而远近闻名。去年，石梯村要在一块近 72 亩的梯形山坡上种满核桃树，“每天都在计算，这么大的面积能种多少棵树，要用多少费用。”吴琼和村支书拉着 20 米长的皮尺，边量边记。现在，核桃林已初具规模。

“这孩子真不赖，干活儿还负责任，村里大事小事都少不了他们。”石梯村村民翟士德没事就喜欢到吴琼这边来坐坐，接受点“新东西”。三年时间，吴琼的“村官”工作已经得心应手，在村里下户时，他总能听见村民热情地招呼“大学生来了啊！”吴琼感慨地总结：“在农村生活了 3 年，生活的圈子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却害怕会很不适应城市生活。”

记得今年春节初四那天同学聚会，与身居城市的其他同学鲜艳另类的服装相比，整天钻核桃林的吴琼外表显得“土”了些。同学们七嘴八舌开始点菜，吴琼起身伸出右手说：“大家静一静，我对点菜有三点建议。”此言一出，同学们扔下菜谱纷纷转头对着吴琼大喊：“你太官味十足了！”十几人围在一张大桌前，讨论着网游，吴琼插不上一句。“开吃前，他们集体鼓掌说‘请吴书记发表祝酒词’。”吴琼摇头苦笑着，“其实我可能只是比其他同学多了些总结归纳的能力。但不到 3 年，我开始有点跟不上他们的变化了。”续约最保险边找工作边充电。

3 月 20 日早上 7 点半，吴琼背着书包，抓着从公交站旁小摊上买来的早点，急匆匆跑进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第一阶梯教室。进门后，吴琼直奔第一排，趁着上课前的一点工夫，左手拿着豆浆，右手压住课本，抓紧预习新课内容。

9 点，天阴沉沉的，满满当当的 100 多人，窒息得让人恍恍惚惚的。课堂上有的同学已经昏昏欲睡，而吴琼手中的圆珠笔仍在笔记本上发出“刷刷”的响声。“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也

睡觉，现在这些孩子和我以前一样，不知道自己缺少什么，想要什么。”吴琼开始用“孩子”这个词来形容“85”后的学生。

每到周末，吴琼都要坐车3个小时往返于首师大，“在那儿考了专升本的法律专业，给自己充充电，以便在找工作时不落下风。”据悉，在青龙湖镇的18名“村官”，大部分都像吴琼一样来回奔波于英语与政治等不同补习班之间。

吴琼做CEO的梦想恐怕要推迟了，去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报纸上一个又一个破产、倒闭和就业难的话题让他越来越郁闷。“现在的企业都纷纷裁员，我能到哪儿找工作呢？”闲下来的日子，吴琼开始动手制作简历，“村官”经历成为简历中着墨最重的一部分。“当村官能得到实践的锻炼，但最终还是要走向社会的。目前我们只能在等待中寻找机会。如果有专门面向‘村官’的专场招聘会该多好！”

除此之外，考研、考公务员和续签，三条出路摆在“村官”面前，“虽然考研和考公务员会优先考虑，但是很少有人离开学校三年之后还能重新考回去，到底选哪条出路谁都说不清。大部分‘村官’还是准备考取国家公务员或是找工作，同时也都抱着续约一年的准备。目前的就业形势下，续约可能是最稳妥的。”

吴琼每个月的工资是2500元。这些工资由财政统一补贴，另外村里包住，还有一辆他戏称“专车”的二八自行车。“一般村干部的工资比大学生‘村官’要低500元到1000元，我们这个收入和他们相比也不算低了。”卢胜辉说：“我们在村里，平时基本上也花不到什么钱，这个工作还能解决北京户口，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选择。”（《北京晚报》赵喜斌）

上海大学生村官回校园招人

毕业后毅然选择农村的大学生“村官”，扎根农村进行农业创业的青年人……19位在郊区就业创业的青年走进了上海理工大学，为近300名大学生们首开讲座。这也是由团市委主办的“青春的抉择”——“春暖浦江”大学生就业创业大讲堂启动的首场讲座。

首场讲堂以郊区农村为主阵地，19位首批受聘的“讲师”都是在郊区成功就业创业的青年，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帮助大学生了解农村，动员有志青年下农村，为新农村建设贡献青春和力量。

首批“讲师”中，有不少是大学生“村官”。去年5月走马上任的李俐现在是松江区新浜镇南杨村村委会书记助理，工作半年，李俐说她感觉最真切的新农村变化快。“农家书屋、老年活动室、村级道路与一座座危桥的翻建，每天都有变化，每天都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她庆幸自己这半年内能与南杨村一同成长。现任金山区廊下镇中民村党总支书记的李羚是回

乡支持农村建设的“三支一扶”大学生。她是土生土长的廊下人，从小家境并不富裕，当初为了跳出“农门”刻苦读书考大学，但毕业后却选择了回农村，“我觉得其实农村也有一片广阔天地，但要干出一番事业，必须肯坚持，不是凭一时激情。”

也有不少在农村创业的青年人。马自强出生农民家庭，从小立志通过读书跳出“农门”，去年他放弃了白领生活，回到家乡接过父亲的接力棒，经营自家果园。通过对栽种方式和种植品种的优化、引进新品种、多元化经营等一系列方式，他的果园去年销售总额达到 32 万元，比 2007 年多出整整 10 万元。“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只要自己摆正心态，设立切合实际的奋斗目标，并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奋斗，终能取得成功。”他告诫在座的大学生。昨天讲座结束后，还举行了郊区农村就业创业信息接洽会。浦东、杨浦、宝山、嘉定、金山、奉贤、南汇等 7 个区的团委为大大学生提供了就业创业的相关信息，并设摊进行政策宣传和咨询。团市委副书记钟晓敏、上海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白苏娣等领导出席了本次活动。（《青年报》）

“大学生村官”悄然报考公务员

“很多在基层的大学生村官都想进军公务员队伍,我也不例外。”泰顺县洲岭乡上舟垌村支部委员、村主任助理李永鹤昨天这样向记者表示。温州从 2008 年开始有大学生村官,按照常理,他们应该在工作满三年后才会参加公务员考试,因为那时将享有相关的优惠政策;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却出现在了今年的温州公务员考试的考场上。

瓯北江北街社区居委会主任助理吴盛洁,她在去年 7 月创建了温州大学生村官网,并建起温州大学生村官网 QQ 群,目前,QQ 群成员已有 92 名大学生村官。据她介绍,他们这群人绝大多数要参加公务员考试,只不过有些人要等到满 3 年后才参加考试。

大学生村官为什么提前进行公务员考试?李永鹤认为,大学生村官跟其他乡镇干部做的工作相差不大,但是待遇上有天壤之别,一个月除掉保险,收入不到 1000 元,社会上也有人把他们看成临时工。他说:“好在乡镇领导对我很好,所以工作还是有很大的冲劲。”

大学生村官凌晓伟也参加了今年的公务员考试,他目前担任瑞安安阳锦湖街道花园社区的主任助理。他认为,如果工资太低,会形成恶性循环,有些大学生村官开始做起兼职工作,这样很难长期对新农村建设做出贡献。他说:“我准备一边工作,一边考事业编制或公务员。”

永嘉县徐岙乡樟岙村村主任助理何忠在今年公务员考试中落榜后,在自己的 QQ 空间里写下了一篇《献给公考失败的朋友们》:“19 日晚间,浙江省公考笔试成绩公布……沮丧、愤怒、忧愁、欢喜?不同的分数牵动着不同人的心情,我也以失败告终,我也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考公

务员的料……我祝福考上的朋友们,愿你们好运……”

“大学生村官模式”从农村包围城市是否大材小用？

北京 5000 名大学生社工三年内将走马上任，届时全市每个社区将有两名大学生。

大学生社工是权宜之计吗？

是“化危为机”之举，化大学生就业难之危，为加快推进社区队伍建设专业化、职业化之机

社会工作作为一项社会职业，对不少人来说可能还比较生疏。如今，这个职业已经在悄悄升温。业内人士认为，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职业的兴衰，其背后体现了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的调整。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社会建设列为四大建设的重要内容，而诸多社会工作是社会建设的有机部分，“社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以北京为例，为了加强社会建设、改善民生，2007 年底党的十七大之后，该市在全国率先成立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这个新机构主要职能是加强社区管理与服务、社会组织管理与服务、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志愿者工作和社会领域党建等，这在以前都是薄弱环节。

“我们提出，力争用 3 到 5 年的时间，在北京社区建设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社工队伍。”北京社工委书记、社会办主任宋贵伦告诉记者，从总体上来说，北京市社区现有工作人员的素质偏低，年龄偏大，工作方式偏于传统，这与新形势下现代化社区建设的要求存在较大的差距。

据统计，北京市社区现有 1.6 万名专职工作人员，年龄在 40 岁以下的仅占 29.2%，50 岁以上的占 30%；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仅占 9.8%，高中(中专)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 62.4%；从事社区工作前，已从原工作岗位离退休的占 24.1%，下岗待业人员占 52.1%。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趁着眼下社区居委会、社区党组织换届选举之机，北京各区县的社区面向社会公开招录新人员，要求应聘人员 40 岁以下、学历在大专以上。宋贵伦说，从报名看，非常踊跃，其中不乏应届本科毕业生、硕博研究生。

除了这一常规性的“招兵买马”，针对今年金融危机下应届大学生毕业生就业难的现实，北京市推出新举措，从首都高校应届毕业生中，选用 5000 名本科生、研究生到社区，做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站、商务楼宇社会工作站专职工作者。具体步骤为：今年各 2000 人，后年 1000 人。这三批社区服务岗位由北京市财政和区财政“买断”。

“一方面是解决了眼前的困难，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加快了北京社会工作者专业化、职

业化的进程，是‘化危为机’之举——化大学生就业难之危，为加快推进社区队伍建设专业化、职业化之机。”宋贵伦所言不虚，跟其他省份一样，北京也承载着大学生就业难的难题。据统计，今年北京市将有 21 万大学生面临毕业，比去年增加 1.4 万人，创历史新高。

据悉，这些社区工作岗位主要以应届的北京生源毕业生为主，而外地生源的优秀毕业生也将被充分考虑。外地生源一旦被选聘，经过两年工作的考察，如果表现良好，可以解决北京户口。

薪酬和待遇也是很多人关心的。宋贵伦说，待遇低、任务重一直是社区队伍建设不利因素。据调查，北京市此前社工队伍的年收入只有 2.4 万元，远远低于北京市职工年收入 3.9 万元的平均水平。2008 年 9 月，北京市首次召开社会建设大会，出台了《北京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试行)》，首次对社区工作者的待遇等进行了规定。按照此办法，从 2008 年 1 月补起，社工的年收入已达到 3.4 万元。

“这个收入是比较合理的，相当于在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工作的待遇。”宋贵伦说。

大学生进社区是大材小用？

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很大一块要由社区承担，没有一定的服务能力很难做好。

在多数人的心目中，社工就是在居委会、街道及社区贴个通知、调节个纠纷的大爷大妈们。让大学生去社区做一些琐碎的工作，会不会大材小用？这种对社工职业的模糊认识并不少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老百姓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不只是满足于基本的生活需要，如水管子是否有人换、老年人是否有人陪着看病等，而是越来越多样化，层次也越来越高。社区工作，无论是居委会的自治、居委会党组织的工作，还是社区服务站的公共服务，仅仅靠热情、奉献精神，没有一定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很难把社区工作做好。”宋贵伦说。

宋贵伦认为，政府应该有两大职能：管理和公共服务。管理职责主要在市区政府以及各个行政执法单位，而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很大一块要由社区和街道办事处承担。眼下，北京市尝试通过建设新型社区服务站，说白了，相当于社区的“办事大厅”，将政府的服务职能延伸到社区。北京市政府今年准备拿出 2 亿元，再建 200 个规范化社区服务站。“这些都是大学生社工发挥才能的领域。”宋贵伦说。

按照部署，大学生社工的岗位主要分布在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站和商务楼宇里。据统计，北京市有 2500 个社区、1200 多座商务楼宇，而且近年来，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如雨后春笋，共有 100 多万个。据粗略统计，随着政企分开、政社分开的步伐加大，北京市 70%-80%领域的人群在社会建设的领域。大学生社工的工作空间有多

大，不言而喻。

“我觉得，大学生做社工可以有效地避免专业对口学生有专业无职业，社区工作人员有职业不专业的尴尬。”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大四学生李昕说，以往师哥师姐们在面对用人单位的招聘时，不得不频繁地解释“什么是社会工作专业”，大多数人最后的工作跟专业无关，陷入一种学而无用的境地。

从大一起，李昕就在北京的社区实习，他发现，传统的社工的工作方法有的并不正确。比如，拆迁纠纷是经常碰到的。居委会处理的办法过于简单，就是递单子、劝说拆迁户尽早搬走，而不是首先区分案主的要求是否合法合理。对于社区的残疾人，通常是努力为他们申请低保、补助，靠残吃残，而不是“助人自助”。李昕在实习的过程中，就试图用专业方法来纠正，颇有成效。

如今，正赶上北京各区县的居委会招录新人，让李昕和同学们非常兴奋，大多数同学都报名了，热爱社会工作的李昕说，比师哥师姐们幸运的是，他赶上了社区工作蓬勃发展的机会，“我相信，我学的专业是春天的专业！”

“高校毕业生具有知识层次相对较高、创新能力相对较强、精神活力相对充足的优势，能够有力地促进扩展社区管理和服务的领域，创新社区服务的方式，改进社区管理的方法，提高社区管理的水平。”宋贵伦说。

“小巷总理”面临哪些挑战？

有专职从事社保、司法纠治的，还有为特定人群服务的，要求社工的相关专业知识特别丰富。

社会工作涉及面宽广，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慈善、卫生保健、残障康复、优抚安置、青少年服务、司法矫治等，无不涉猎。对于今年要踏上社区岗位的 2000 名大学生来说，要做好一名“小巷总理”，要面临哪些挑战呢？

北京市建工学院社会工作专业大四学生马薇已经报名北京西城区社区工作人员的招聘，而且取得了做工程师父母的支持。马薇亲切地形容自己将来的职业是“京城里的社区官”。马薇的师哥师姐有在农村做“村官”的，她经常去看望他们，基层就业的活力在深深吸引着她。“比起村官，社区官面临的人群不一样，村官面对的是村民，因此，土地政策方面的知识要特别熟悉，社区官面对的是城镇居民，怎么办理社保手续等知识就要及时学习。”马薇说，社工也有具体的分工，有专职从事社保、残疾人服务、司法纠治的，还有为妇女、老人、社区志愿者等特定人群服务的，所以要求社工的相关专业知识特别丰富。

马薇说，社会工作专业实务性特别强，在学校时，别的专业实习时间为 400 小时，社会

专业就要 800 小时，但是，马薇还是觉得不够用，尤其是她在房山区一个社区实习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在针对特定人群组织策划活动的能力等方面还是欠缺。“挑战不仅仅是针对我们学生的，也是给学校培养人才提出来的。”她建议，最好在专业教学时定位明确，可以分医疗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等方向侧重培养学生。

大学生做社工，也会面临生活阅历浅、社会经验不丰富的考验。在社区实习时，让李昕感觉特别棘手的是一个单亲家庭纠纷：孩子跟着离异的母亲，孩子的父亲太想孩子了，经常来小区看望，但孩子姥姥不让看，一来就闹。“我去处理时，他们都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根本不信任我。”

“当然，大学生做社工需要社区根据他们的特长来安排，要人尽其才。”北京双寺社区居委会主任杨宝平说，让大学生去调节家庭纠纷就显得“阅历浅了些”，只能以后边工作边积累，但是青少年教育却是他们拿手的，可以发挥他们这方面的特长。

北京西城区社工委副书记高建军建议，大学生做社工不能好高骛远，一定要记住“耐烦”两字，因为居民什么问题都可能找上门来，邻里吵架啊，养狗养猫啊，非常琐碎，一定要有足够的热心和服务精神，还要有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才能做好一名“小巷总理”。（《中国教育报》赵秀红）

政府应发放特殊补贴鼓励大学生农村就业

当前,受金融危机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2009 年全国有 610 万高校应届毕业生,历年累积的未就业大学生有 250 多万,目前全国共有 860 万大学毕业生等待就业。同时,2000 多万失业农民工需要就业,还有几百万自然增加的青年等待就业,当然还有其他方面,如复转军人、新增农民工等。

据测算,今年全年新增城镇就业岗位最多为 900 万。

城市的就业容量十分有限,历年累计的 250 多万未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就是明证。长期累积下去,没有哪个社会能够负担。农村是中国历来最广阔的就业渠道,是有效释放就业压力的“安全阀”,也是最迫切需要人才的地方。我们应采取组合政策积极引导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就业,通俗地说,应该及时启动新时期的上山下乡工程。

具体说,选招 200 万大学生到农村任教师、医护人员、农业技术员、公共服务人员和“村官”,也可以安排到农业产业化企业中。每人同时联系一户村民,帮助其脱贫致富。每批期限可安排 2 年,期满可以返回重新参加毕业分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给予特殊补贴每人每月 4000 元左右,总计支出为 2 年 2000 亿元左右。

顺利实施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 大学毕业生难以适应农村艰苦的环境, 而且到农村就业没有面子。应该明白,单靠城市不可能长期支撑如此庞大且越来越沉重的就业压力。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生活条件虽然不如城市,但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只要在农村能够得到发展,干出一番事业,“面子”自然会有。可以预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会出现在农村,大学生并不只为城市培养。当然,如果现在能够在城市找到工作甚至很好的工作,那就不必到农村就业,并不是说每个大学毕业生都必须到农村就业。

其二, 不要认为, 到农村无事可干, 专业不对口会形成人才浪费。农业产业化、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甚至维持、农业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农村多方面综合信息的获取、农村公共服务方面以及农村事务管理,都需要大批高素质人才。只要通过磨合实现对接,大学毕业生在农村大有可为。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应当避免“眼高手低”,期望值也应当适中。至于担心专业不对口造成人才浪费,也不必过分夸大。目前的大学生就业与计划经济时期的毕业分配有很大不同,专业对口率越来越低。大学四年学习依然是素质提升为主,如果一个人抱定终身从事自己在大学所学的专业,固然很好,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才流动会表现出更多灵活性。

其三, 这笔特殊补贴从哪里来?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此次拿出 4 万亿元应对金融危机,这在 5 年前是不可能的。实施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第一年多支付 1000 亿元就可解决 200 万人在农村的就业问题,以后逐年增加 1000 亿元,也是财政收入增长能够承受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中国社会的健康运行就能得到较好保障。当然,具体该补贴多少,各级财政如何分担,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其四, 我的建议绝没有强迫的意思, 反而应该充分尊重就业者的选择。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必须通过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双向选择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应该给予更高的补贴(每月 4000 元是一个较高的收入标准),否则没有人愿意报名到农村就业。当然,如果每月 3000 元补贴具有充分的激励效果,政府负担就会更少。如果一个大学毕业生宁肯在城市失业,也不愿意到农村就业,那是他的选择,政府和社会应该尊重这种选择。

其五, 新时期上山下乡, 只能到偏僻农村吗?这里并不是特指条件非常艰苦的农村,还包含一些小城镇。但可以积极鼓励他们到老少边穷地区就业,因为那里更需要高素质人才。

其六, 只要有高额特殊补贴就可以吸引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就业吗?我建议采取组合政策实施这项工程。如期满返回者继续享有应届毕业生的有关就业政策; 参加研究生和公务员考试者,适当降低录取分数等等。(于鸿君《南方农村报》2009-3-25)

湖南安乡：用活大学生“村官”，为新农村添活力

今年，安乡县新选了6名大学生“村官”到基层工作，为该县村干部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这批人入村后，县、乡、村三级党组织按照以人为本、严管厚爱的原则，立足实际，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他们发挥作用，为安乡新农村建设增添活力。

一、加强人文关怀，激发大学生“村官”工作热情。针对刚毕业的大学生普遍存在对农村情况不熟悉，对农村工作认识不充分，缺乏扎根农村的思想准备等特点。一是下发任职文件。各乡镇以乡镇党委名义对各大学生村干部到村任职正式下文，3名大学生“村官”担任了村支部书记助理，2名担任了村主任助理，1名担任了村党支部副书记。二是热情沟通。通过举办县情乡情教育培训班，带他们串组入户，召开群众座谈会，增进他们对农村的认识。利用每月工作例会，及时对他们的成功经验进行总结。三是协调财政、劳动等相关部门，确定了大学生村干部待遇，工资由县财政统一打卡发放。为他们购买了“三险”，即：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二、健全管理机制，保障大学生“村官”有位有为。为帮助大学生“村官”找准自己的位置，尽快进入角色，安乡县建立了领导干部联系大学生“村官”制度，明确专人作为他们的引路“老师”，促进他们发挥“四员”作用。一是政策宣传员，向农民群众宣传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科学生活知识。二是农业科普员，及早熟悉和掌握农业技术、农村政策、村务管理、科技致富、乡村文化等相关知识。在村民遇到农业技术难题时，及时请教专家、学者，为村民解决问题，并合理运用自己所学知识，引导村民创业致富。三是决策参谋员，认真调研，思考出路，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合理化建议，协助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管理好村务。四是民事调解员，对村民纠纷等农村工作耐心细致，逐步掌握农村工作特点，适应农村的生活。

三、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大学生“村官”的作用发挥。一是完善各项工作制度。安乡县委出台了《大学生村干部管理办法》，办法规定了选聘的对象、条件、程序和原则；任职的期限以及聘用、解聘的程序；考核的办法、等次和奖惩的办法；政治、经济待遇；教育培训的内容和原则；大学生村官的管理与监督。二是强化培训帮带，创造良好环境。由乡镇组织委员担任大学生“村官”的指导员，帮助他们制定三年工作目标，和年度工作计划，并定期听取工作汇报，分阶段督导工作的落实；第二是抓好培训。入村前统一对“村官”们进行了镇情、村情、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培训，同时协调县各单位，为以后顺利开展各项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第三是抓好学习。实行定期集中学习和以检查督学、制度保学为辅助的学习制度，

要求“村官”们记好学习笔记，写好学习心得，月终小结，季度和年度总结。三是创新机制，促进作用发挥。首先是实施“政绩”管理办法，建立了大学生“村官”个人“政绩档案”，作为半年和年终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其次是要求每一个大学生“村官”把自己每天的工作目标、内容、完成情况等，建立台帐，并不定期的进行检查，从而规范了“村官”的工作行为；第三是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文化层次高，创新能力强的优势，在大学生“村官”中广泛开展“五个一”活动，即：协助村两委理出一个好思路；为村里介绍一个好项目；帮助一个贫困户脱贫致富；解决一个群众关心的问题；树立一个群众满意的好形象。

四川“大学生村官”：路怎么走？

青神县于2007年开始进行大学生村官的聘用和培养，目前共有75名大学生村官在该县的各个乡镇发挥着自身的才能，为推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群众致富增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近日，该县县委组织部门分三个片区召开了全县大学生村官座谈会。在会上大学生村官们说出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和困惑，归纳起来有以下表现：

角色及职能定位不够明确。部分乡镇和村两委对大学生村官这一特殊群体的角色定位把握不准，在工作中对大学生村官随意使用，把他们当成“打杂”干部。

工作能力提高缓慢。大学生村官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急需人才，其能力上的欠缺阻碍着他们知识优势的发挥，在工作中体现他们缺乏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对未来出路的困惑。有些村官对以后的工作和出路有很大的担忧。“三年村官合同期满后，大学生村官的处境会很尴尬。想留在基层，可编制有限制；去企业，3年的基层工作经验付之东流不说，再找自己所学相关专业的就更难了。”这个问题关系到大学生村官的切身利益，影响到他们以后的生活方向。

针对以上问题和困惑，确保大学生村官能“引得进、用得好、留得住”，青神县在进一步完善大学生村官的工作生活条件的同时，特别制定了大学生村官跟踪培养管理机制，实行“村官”信息交流制度、片区述职制度、目标跟踪制度、自治管理制度、创业激励制度。

在此，笔者就大学生村官跟踪培养管理机制谈谈自己的看法和思考。

要引进适合村社发展需要的、能尽快发挥作用的大学生村官。在招聘环节上，必须充分考虑大学生村官的自身情况和村组的实际需要，在报考时进行正确的导向。根据他们的专业、兴趣爱好、工作特长等情况，结合各村实际需要，使他们尽量报考符合自己专业特点，能充分发挥自身知识才能的村。同时对原籍在本县的大学生，尽量选派到自己的家乡工作，让

其能尽快进入角色；对籍贯在县外的，可安排其到产业有一定规模、工作和生活条件较好的乡镇任职，以尽快适应基层工作。

要让大学生村官“用得好”，把他们的优势和特长得到最大化的发挥，就要进一步完善培养和管理机制。组织部机关干部、乡镇党政领导、村干部要共同做好大学生“村官”的“传、帮、带”。组织部机关干部要做好思想指导，及时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思想动态等，帮助健康成长；乡镇党政领导做好实践指导，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村两委干部做好工作指导，教其参与村级事务，熟悉了解村情民意，帮助更快适应农村工作。

同时需要对大学生“村官”资源进行优化整合，配置到最适合的地方。可以组织全体大学生村官根据自己所学专业 and 特长组合志愿服务队，发挥整体作用。比如精通电脑的，可以组织起来对全县远程教育终端站点进行定期的保养维护等；学金融财会的可以对各乡镇和协会的资源分析整合，提出全新、完善的营销方案；一些数学、英语之类专业的可以成立家教中心，加强对留守儿童的教育辅导等。

要想让这些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村官“留得住”，必须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和激励制度，激发工作热情。对大学生“村官”的评价，应以日常考核、季度考核、年终考核情况，结合乡镇、村两委干部以及村民的评价，从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进行，把述职评议结果作为今后干部聘用、评先、评优的主要依据之一。对他们的激励：一是工资待遇上，应实行固定工资和绩效考核相结合的政策，并实行待遇增长机制，根据工作的年限浮动工资待遇。另外是对他们未来出路的安排：现在很多大学生村官担忧着三年后的出路，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这上，可考虑在每年的事业编制和公务员报考上对他们实行一些优惠、倾斜政策。这样有利于稳定他们的心理，促进相互的良性竞争和发展，增强工作积极性和自信心，切实提高大学生村官基层工作成效。（徐红《眉山日报》）

●延伸阅读

直面大学生创业“三重门”

继在去年“两会”上提出“政府应该设立大学生就业专项补贴”后，一年后的今天，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绍兴文理学院党委书记王建华，则建议并力推大学生进行网络创业。

导致王建华作出这一转变的，是他对今年大学生就业环境的新认识。今年，610万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构成了中国就业史上最壮观的一道就业洪流。而横亘在洪流中央的，既有美

国的金融危机，也有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二者的叠加共同放大了就业困难。因而，除传统的就业外，作为疏导就业洪流的另一条出路——创业，也引起了社会高度的关注。

但创业从来都是困难的。对刚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来说，其创业之路面临着心理、资金与经验的三重考验。

一重门：创业环境亟待改善

最近，《中国青年报》公布了一项调查数据：79%的被调查大学生有自主创业的意向。如果说这是一个好消息的话，另一组数据却让人高兴不起来，根据王建华掌握的数据，目前我国真正选择创业的大学生只有 0.3%，广东是全国比例最高的省份，也只有 1%。但这个比例在美国却高达 25%。

心很热，手很凉，是对我国大学生创业的最好概括。愿望大于行动背后，是一系列桎梏，制约了大学生从容创业的空间。“缺乏‘闯劲儿’是大学生不敢创业的很大一块‘绊脚石’，大多数大学生对创业心存惧怕。”从事过多年就业指导工作的青海师范大学周晶老师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记者调查发现，除畏难情绪外，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大学生高谈阔论创业理想的多，立足于现实的少。学生总感觉，创业就要做“英雄”们那样的大事业，搞高科技、创新型企业，却不太重视社会现实的需求。由于总强调要与“大学生身份”对应，却难以寻觅可以成就大事业的机会，梦想总悬在空中。

有观察人士指出，大学生之所以放不下身段，和社会环境有莫大关系。近几年，被媒体报道的大学生创业卖猪肉、卖盒饭之所以引起巨大的争议，深刻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大学生创业的社会环境很不宽松，社会上还存在着大学生创业必须“做大事、创大业”的观念障碍，这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创业率。而一位教育界人士则指出，近年来各地纷纷设立大学生创业基金，在扶植大学生创业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大部分基金都强调，鼓励创办科技企业，最好拥有自己的专利成果。这使得大学生在选择“非主流”的“小本生意”创业时，往往受到更大的限制。此外，这也超越了大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实际——让初出茅庐的学生们去办高新技术企业，大学生会产生更大的心理压力。麦可思公司的王伯庆博士认为，要鼓励大学生创业，最主要的是要改善整个社会的创业环境。

二重门：融资渠道有待拓宽

而大学生即使下定决心创业，也并非一帆风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国学专业本科生熊龙，如今还有一个离自己专业很远的“身份”——“鉴东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在，熊龙最大的问题是得不到资金支持。“我研究过各种创业优惠政策，知道有小额

贷款、税收优惠，但是我跑到银行、工商一问，对方不是不知道就是手续繁琐，最后只好不了了之。”家里赞助的几万元钱快用完了，“鉴东方”不知道还能走多远。

有关调查显示，有 73.47% 的大学生所能承受的自主创业资金不足 10 万元；61.63% 的大学生认为“缺乏启动资金”是创业的最大障碍。周晶表示，大学生并不乏创业创意和创业项目。而现实中，创业贷款、基金难申请，手续繁琐，令人望而却步。对于农村大学生而言，更是因为找不到有效担保人而无法申请，让很多有创业热情的学生“抱憾而归”。

正常的贷款难以申请，引入风险投资也是困难重重。2005 年成立的上海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是全国首个由政府投入支持大学生创业的基金，被大学生们称为“天使基金”。据该基金会统计，2006 年至今，基金会已投资的 293 家大学生企业中，有稳定销售收入、利润与一定发展前景的企业约有 50 家。但这些企业距社会风险投资和产业资本的标准，仍有很大距离。如果没有科创基金的“照顾”，这些企业将很难创办起来。“我们并未拘泥于高科技项目，那些凭借一个金点子和敏锐的市场嗅觉开展的创业，我们一样给予支持。”科创基金秘书长张德旺说。但这种支持也引发一些人的疑问：“投入几千万给学生，然后看其中 80%-90% 关门，政府值得这么冒险吗？”科创基金的遭遇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大学生创业融资的难度。因此，大学生们不得不从现实中汲取教训：“要创业最好是家庭条件宽裕，才能经得起折腾。不然还是先找个工作解决生计比较现实。”

张波是共青团重庆市委城市青年工作部部长，他通过调研发现，资金瓶颈的成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各级政府的投入难以在短时间内满足大学生创业需要；二是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以及缺少相应捐赠法规，社会捐赠有限；三是银行缺少风险评估机制，缺乏财产抵押担保，融资困难。

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经济系副教授王艳茹看来，为鼓励支持大学生创业，我国政府出台了众多扶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明确规定了对大学生自主创业的资金、税费、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支持，但目前各种创业政策缺乏整体性。在实际操作中，政策障碍仍然存在。王艳茹曾花了整整一个学期的时间，才把 2002 年以来国家出台的各类创业政策梳理清楚。她指出，目前国家各部门之间在制定政策时有时会缺乏沟通和协作，各部门的创业促进政策整合性不强，“如果有一个像美国的中小企业局一样的机构，专门负责创业事务的部门就好了。”

三重门：创业经验还需积累

除资金因素外，创业知识和创业经验缺乏也是阻碍大学生创业的难题。2006 年从沈阳化工学院信息管理专业毕业的崔英，毕业后向家人借款 12 万元，开了一家婚庆公司。然而由于店铺选址太偏僻，店铺规模档次“高不成、低不就”，一年下来赔了 8 万元。

摊子再小也有风险，一不小心，很容易就被市场经济的浪花打湿。重庆大学生创业基地负责人雷程亮分析，大学生普遍缺少社会阅历和经验，对公司不具备完整的管理体系，同时对市场的分析、判断、处理等方面的能力还很欠缺。不少人连开办公司的基本流程都不知道。

麦可思公司在对 2007 届大学毕业生创业情况进行调查后发现，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困难主要是，缺少资金(31%)，市场推广困难(25%)，缺乏企业管理经验(20%)。后两项都与创业知识、经验有关。

“大学生接触社会少，没有工作经验，创业能力弱，这很正常。”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任占忠说，根本原因在于学校创业教育薄弱，教师观念落后导致学生创业意识差。”

接受采访的大学生，印证了任占忠的观点。他们表示，虽然在校园中听过创业讲座或论坛，但很难获得系统知识，对创业“一头雾水”。对国家给予大学生的创业优惠政策知之甚少。一些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的指导老师也了解得“不是很清楚”。

事实上，1998 年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就曾提出，大学应帮助学生实现三本“教育护照”：一本是学历证书，一本是职业资格证书，一本是创业教育证书。“遗憾的是，这一理念并未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得到有效体现。由于创业教育的缺位，大学生在接触社会不了解创业的状态下投入创业，成功的概率也就可想而知。”重庆工商大学校长助理苟朝莉表示。

各种因素的制约，导致目前大学生创业成功率极低。教育部 2004 年的一项报告披露，全国 97 家开张比较早的学生企业，赢利的仅占 17%，学生创办的公司，5 年内仅有 30%能够生存下去。2005 年的另一项统计则表明，创业企业成功率在 30%左右，而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只有 2%-3%，远低于一般企业。到 2007 年，根据零点公司的调查，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只有 0.01%。

放眼世界，大学生创业在各国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全国人大代表、南通大学校长顾晓松分析指出，国际职业教育大会提出，21 世纪将有 50%的大学生要走自主创业之路。“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国家大学生创业的道路还很漫长。党和政府应该在这种时候帮个忙，推一把。”（009-03-20《中国人事报》）

国外如何鼓励大学生创业

英国

1983 年，由英国王子基金启动青年创业计划，目的是动员企业界和社会力量，为 18-30 岁的青年提供创业咨询以及技术、资金和网络支持。1999 年，英国王子基金和威尔士王子国际商业领袖论坛，共同组建了青年创业国际计划，为大学生提供发展债券式的创业启动资金，资金总额为 2800 万美元。对于每一个创业项目申请，计划规定最高贷款额是 5000 英镑。对

于符合条件的特殊困难群体，可分别提供 1500 英镑（针对个人）和 3000 英镑（针对集体）的创业赠款。

法国

专门成立隶属于法国青年、国民教育和研究部的青年挑战署，也是法国第一个年轻创意和青年项目孵化器。作为一个政府职能部门，这个机构旨在培养和促进 15 岁-28 岁青年的创新意识，并给予青年创业项目具体的评估、指导和资金援助。

美国

美国刺激创业活动的主要做法是开展创业教育和鼓励创业风险投资。1967 年，斯坦福大学和纽约大学首次开设了当代工商管理硕士创业教育课程体系。1968 年，百森商学院首次在大学本科生中开设创业方向。1973 年，东北大学开设了美国第一个创业学本科专业。进入 1980 年代，美国创业教育突飞猛进。1982 年，开设有创业教育课程的高等院校增加到 315 所，1986 年为 590 所，1999 年达到 1060 所，到 2005 年初，有 1600 多所高等院校开设了创业学课程。当前的美国创业教育课程体系非常完备，涵盖了融资、创立、管理等方面。通过创业教育，大量的大学生走上创业的道路。

美国也鼓励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通过市场的力量，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2000 年，美国 40 万个积极天使投资人在大约 5 万个投资项目上投资了 400 亿美元左右。目前，每年大约有 30-35 万天使投资人对 5 万个项目进行投资，天使投资市场规模将保持 300 亿美元左右，天使投资已经占到创业投资总额的 40%-50%。

●高层观察

薄熙来妙解“干”的六层含义

3 月 17 日，重庆市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强调指出，重庆能不能保稳定，促和谐，加快发展，干部队伍至关重要，今年要着重抓作风、抓学习、抓廉政，而优良的干部作风集中起来就是一个“干”字。薄熙来指出“干”有六层含义：

第一“要干”，要当挖山不止的愚公，不要当指手划脚的智叟。

第二“要自己干”，不能做“甩手掌柜”，潇潇洒洒当“二传手”，要亲自抓，亲手干，而且要一抓到底。不能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

第三“要率先干”，要身先士卒，做好表率。

第四“要早干”，有只争朝夕的作风，不要拖拖拉拉。

第五“要高标准地干”，精益求精，要干就干出水平，不要马马虎虎、流于一般。

第六“要齐心协力地干”，继承和发扬咱重庆“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好传统，团结干事。（重庆日报，3月19日）

周小川勇敢地捅了美国的马蜂窝

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出现了严重缺陷,全球经济拴在美元身上,就相当于拴在美联储与美国政府的道德裤腰带上。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 23 日公开发表文章,提出应该继续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具体内容包括: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经济金融政策监督,提升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长期内稳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这一番言论捅了美国的马蜂窝。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举行新闻发布会时称,全球投资者将购入美元视为安全投资,而美国经济则更为稳健。他对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创立新的全球货币形式以取代美元的建议表示了怀疑,称“并不认为有必要设立一种新的全球货币”。在 4 月初的 G20 峰会上,他希望达成的目标仅限于,全球富裕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都应传达需要采取行动解决全球经济萎缩的决心。

美国财长盖特纳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上,明确对让美国弃用美元转而启用某种世界货币的提议持批评态度。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这位克服美国上世纪 70 年代通货膨胀的功臣,虽然批评美联储制造通货膨胀风险,同时却又表示中国声称自己“现在持有所有这些美元是不是有些糟糕”的说法不太妥当。他认为,中国持有美元是因为选择了购买美元,中国不想抛出美元是因为不想让人民币贬值。

从这番言论可知,美国并不想承担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责任,从格林斯潘到沃尔克,均把责任推到了储蓄过多的经济体头上。他们不愿意放弃哪怕一丁点的美元铸币税,只希望其他国家拿出更多的外汇储备,实行更多的激励政策,以“共渡难关”。说得直白一些,美国希望其他国家拿出钱来一起替金融危机买单。对于此前欧洲提出的改革方案,以及此次中国央行行长提出的改革方案,统统不予理会。美国作为拥有铸币税特权的超级大国,已经成为国际货币市场最大的既得利益国,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大障碍。无论美国态度如何,无论改革方案如何,国际

货币体系必须改革是大势所趋,这取决于货币背后的经济实力与货币信用。周小川的呼吁是明智的。(每日经济新闻)